

新 字 人 文 化 丛 书

江苏人民出版社

● 吴福辉 著 ●

京海 晚眺



新学人文化丛书

京海晚眺

吴福辉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书 名 京海晚眺
编 著 者 吴福辉
责任编辑 金长发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南京五四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5.375 插页 5
印 数 1—5140 册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1997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1871—3/G·508
定 价 11.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 1 京海两难
- 8 沈从文的上海观
- 14 谁之北京乎
- 18 封面女郎和学院脸孔
- 22 文化转机:上海的马路(一)
- 27 面临现代;上海的马路(二)
- 32 善恶美丑同一

- 40 王府井·霞飞路·京都花见小路
- 46 请“赎买”已逝将逝的文明
- 49 话说信件
- 53 旧派渐渐不“旧”
- 57 发黄的数字

- 61 文化消费在生活中之比重
- 64 张爱玲的宽度
- 68 苏青的上海女人属性

72	鬼才穆时英
76	予且是谁
81	精英文化和平民品格
84	周作人与《骆驼草》
88	胡适的自传
91	梁遇春：领略人生的深味
95	杨绛的讽谕风度
97	难读耐读的诗人
101	刻写心灵的旅程
105	海上升“开明”
109	坐香港图书馆得趣
113	良友画报也曾革新
117	书刊广告琐谈
122	忧患识文
125	使改编成为创造
130	“望子成龙”的悲喜剧
139	泥淖中美的人性
144	《霜叶红似二月花》和同名电视剧
149	文学的地域文化视角
153	现代人之现代文学
156	现代文学经典化
160	世纪回眸：转型与失衡
167	后记

京海两难

近年来,关于 30 年代那场“京海论争”的公案,已经常常成为文化讨论的热门话题,成为历史性评估京派、海派的当然起点。

我看过一些文章,印象中似乎有为京派“辩诬”的趋向。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到每个人的口袋和每家饭桌上,弘扬民族文化之声此起彼伏,“海派”的形象又变得丑陋起来。有两位大家在“京海论争”中的态度、观点被看好,一为沈从文,一为鲁迅。谈到沈从文当年批评“海派”的商业气味,今之论者都认定他并未将上海的作家们一股脑儿地打成“海派”,并特意指出沈明确说过,“海派”作风在北平(北京)照样存在,其参战的立论不能谓不公允,气息不能谓不平和。至于提及鲁迅,则大半赞其深

刻：能一只手打倒“近商”的“海”，一只手打倒“近官”的“京”。鲁、沈两位的文化姿态被认为是同样超拔出群的。

可是，鲁迅和沈从文的立足点，明明白白是不同的呀。

如果把当年的争论资料细细读来，我觉得鲁迅的看法倒是与竭力反对“叫京派来扫荡海派”的曹聚仁相当接近。

比方鲁迅同曹聚仁都说海派显豁，京派隐蔽，而后者越发危险。鲁迅的名句是“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京派”与“海派”》）。曹的妙喻为“知道不能掩饰了，索性把尾巴拖出来，这是‘海派’；扭扭捏捏，还想把外衣加长，把尾巴盖住，这是‘京派’”（《续谈“海派”》）。你看两人的意思是不是差不多？

更有味道的是，鲁和曹都发誓要“误读”沈从文，无视他文章里表达得再清楚不过的词句，认定他批判“海派”的态度不公正，死活说由他发难的这场“京海论争”不是对等的辩论。两人用的都是皮里阳秋的笔法，曹聚仁援引了“京派”批“海派”的文字之后，接着就是满篇的反话：“海派之罪大恶极至此，虽用最黑的咒语诅咒它灭亡，亦不为过”，“所以，海派文人百无一失，固矣”（《京派与海派》）。鲁迅的几篇文章都用讥讽语开头：“自从北平某先生在某报有扬‘京派’而抑‘海派’之言”（《“京派”与“海派”》，与曹的题目只多了两个引号），或者是“去年春天，京派大师曾经大大的奚落了一顿海派小丑”（《“京派”和“海派”》，同前一篇题目只一字之差）。依此看去，鲁、曹确有偏袒“海派”之嫌了。

我有幸亲睹沈从文的风采，已是他的暮年。沈先生温文尔雅，说话绵软如水，哪里像个能争辩的汉子？更没有一丝一毫的“官”样儿。那时候，上海的文人一部分乱了营，拼命在内部对号入座，找谁是“海派”；沈先生一人独挑大梁，从从容容坐北向南，与人多

势众的“海派”辩论，也是因为他自认不沾“官”味儿，可以安然地批“海”。至于到底什么是“京派”，什么是“京派文人”，鲁迅理解的“京”“海”，和沈从文理解的“京”“海”，概念上是否“同一”，几句话自然说不清，但沈从文竟然作了“京派”的代言人，真是历史老人开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鲁迅说过的一切话，当然不是金科玉律。问题是，鲁迅对“京派”的明显的反感，是不是他的一种“失察”？

我以为，鲁迅对“海派”的某种偏袒，在这里应包含着特定的含义。

因为在鲁迅看来，“京派”是传统的流风余韵，是从古久先生陈年簿子里流出来的东西；“海派”则是现代的畸形产物，是摩登女郎唇边的一抹猩猩的口红。一个是封建邪恶，一个是现代流弊。当鲁迅单独面对“海派”的时候，他何曾网开一面过？他过去批评张资平、叶灵凤、曾今可、章克标、穆时英，批评上海的文化、香港的文化，描摹上海的少女、上海的儿童、上海的娘姨，嬉笑怒骂，言词何等严正苛刻，但是，在“京派”、“海派”同时进入他的文化批评的视野时，他的微妙的倾斜，就显露无遗了。封建性的恶，仍然是“封建”的；现代的流弊，毕竟已是“现代”。一个从五四时代走来的思想者能够权衡两者的轻重。我们可以看到，历时几年的“京海”大战，给了鲁迅以深的印象，他身处“京”与“海”的不成比例的对峙中，体会到旧传统的无比强大，便迅速作出了独特的反应。

“京”的强大程度是显然的。不必说那场争论留给历史的遗产主要就是“贬”海“扬”京，即是“京海派”这一词语，我们今日说起来，该有多么顺溜，假如念成“海京派”，立刻便觉咬嘴，别扭异常。上述所引各篇讨论“京派”、“海派”的文章，哪一篇的题目不是“京”在前、“海”在后？连鲁迅也不例外。这就是历史传统的力量。

面对强大的“京派”，左翼作家的态度比较复杂。在茅盾、丁玲

的笔下，上海固然是埋葬封建幽灵的坟地，工人的斗场，但又是中外资本家、金融家的冒险乐园，是下等妓女、乡下姑娘的活火塘。茅盾《幻灭》的开头，女主人就在谈论惹人讨厌的上海。萧红写呼兰河小城充满了诗情，可《马伯乐》里的上海该是多么没有生气。但我们不应忘记，左翼作家其时的大部分正整日生活在这座城市里，而且他们的情况如苏汶（杜衡）驳斥“京派”，诉说海派文人状况时所讲的，“不但教授没份，甚至再起码的事情都不容易找”（《文人在上海》）。他们倒的确都是中国的职业作家。海派不能直接从资本家的口袋掏钱，左翼也不会拿了“卢布”还硬要来过亭子间的苦日子，在文学立即进入市场这一点上，他们是相通的。

所以，当京派高高在上地发起争论，批判海派、批判上海的时候，左翼居然更多的是表示对京派的不满。胡风写过一篇评论，拿北方作者澎岛的小说《蜈蚣船》作引子，副题为《“京派”看不到的世界》，起头就提到那场京海论战，写了长长的一段讽刺京派文人“雅”生活的话。胡风取的是同鲁迅一样的角度。

有位文学家，抗争“京派”比鲁迅、胡风还激烈。他的概念里，“京”也差不多是封建余孽。他是杨晦。我在杨先生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最后几年有幸见过他，无论如何不能想像他是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火烧赵家楼的越墙能手。但他1947年的文章依然火力充沛，他称“京派”是“新士大夫”或“洋士大夫”，注定是要“没落”的，“至于所谓海派的作家呢，虽然是跟工商业都市的兴起一样，是挟带着污浊和罪恶的，却要从这种污浊和罪恶里逐渐成长”（《京派和海派》，不知为何都写同题文章）。他的思路，在“京派”问题上循着鲁迅，对“海派”就不仅仅是“偏袒”二字所能够说尽，简直一鼻孔出气了。不过杨晦的结论可不是用“海派”取代“京派”，他说：“京派是落伍的，所走的是末路。海派是进步的，然而，

也有限度。我们把希望放在农民派的作家身上”(同上)。杨先生忘记了,农民和“封建”是并非绝缘的。这姑且勿论。杨晦毕竟还是融入了中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队伍之中,把“京派”、“海派”都视为中国新文化的对立物,最终加以排斥。

一方面,“海派”好像是个闯入家园的怪兽;另一方面,如果一头栽回“京派”古雅精致的怀抱里去,也不合一代一代新起的青年文化人的意。这种两难的处境,我叫它为中国文化界、文学界驱之不去的“京海梦魇”。

梁遇春的《猫狗》一文,为这“京海梦魇”作了形象的注脚。他说:“上海是一条狗,当你站在黄浦滩闭目一想,你也许会觉得横在面前是一条恶狗。狗可以代表现实的黑暗,在上海这现实的黑暗使你步步惊心,真仿佛一条疯狗跟在背后一样。”

形容上海已经令人惊心动魄。可接下来有一段比喻北京的话,简直能把我们罩回鲁迅的“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他说:“北平却是一只猫。她代表灵魂的堕落。北平这地方有一种霉气,使人们百事废弛,最好什么也不想,也不干了,只是这么蹲着痴痴地过日子。真是一只大猫将个个人的灵魂都打上黑印,万劫不复了。”

他说得真好,也真恐怖。

只有一个人寄希望于“京派”、“海派”的调和。此人是朱自清。朱先生在思考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前景时,曾于日记中提出要把清华大学的文科学风培养成兼有京海之长,乾嘉遗风可以继承却不能墨守,海派的空疏泛论、胡天胡地要转成聪慧灵动(见王瑶的《我的欣慰和期待——在清华大学纪念朱自清先生逝世四十周年、诞生九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鲁迅是不同意京海合流的。他心中的“京”“海”,皆是中国文

化的毒瘤，只能割去。朱自清主张吸取“京”“海”各自的优长，他的京海概念比较温和，好比是说传统的东方文明自有精华，来自海上的西方文明也积淀着全人类的优秀遗产。他不简单化地把“京派”“海派”统统归到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一锅煮了，却是把京海的题目做成一篇包含南与北、海与陆、城与乡、中与西、现代与传统各种20世纪中国文化基本矛盾的大文章。

这里，就接触到了本世纪中国文化演进的基本态势，接触到“京派”“海派”概念在今天的调整与重构问题。我认为，京派它是从封建文化内部分裂出来的，但绝不是盲目崇“中”，不是静止的传统派。它讲究和平地、渐进地、久蓄厚发、不动声色地来吸收现代世界文明。杨晦分析的“京派”的“士大夫”品格，所谓的“新”，所谓的“洋”；他看出京派有现代性，不过他说它是假的，伪的。实际上，老牌京派文人周作人也好，京派才女林徽因也好，都是真正的学贯中西（学贯中“东”——东瀛日本，是拐个弯儿的中和西）。京派方式是一切从“己”出，西化要从中化引来。“海派”正是又一种实现现代文化的模式，是舶来的，以恶开道的，急进的，突发的，甚至是狂轰乱炸，是外部向内部的侵袭、进攻。但是在用发育不全的手段达到敝国朝野上下昼思日想的现代化目的这一点上，它们本没有什么不同。

新旧混杂，中西混杂，进三步，退一步。如果可以这样来批评“京”和“海”，我说一种滞后的、永伴着昔日光荣回忆的文明，除了蹒跚而行，真不知道还能有什么坦途好走。记得年少时看图书架子上列宁的著作，其中有一部题为《进一步，退两步》的，当初幼稚地想过，怎么能如此走路。现在方才明白，进三退一，已经是中国人民最大的福气了。

且看今日域中，京派、海派混杂的局面依然如故。所谓新儒

学,是典型的京派方式,由汉学伸向西学,再伸回到汉学。还有倡导国学、国剧、国术什么的,不是拟想中的京味“爱国主义”吗?而从深圳、浦东等东南沿海地区向全国推进的改革,海洋文明对大陆文明的席卷、渗透,正是不折不扣的海派行为。意识形态上的京派主义、海外京内主义、京外海内主义、中体西用主义、西体中用主义;经济上的海派主义、维新主义、全盘西化主义,等等,等等,都是站在我们面前的活生生的现实。这就是本世纪我们的文化宿命,想超脱也超脱不过去的。

不过话说回来,京海并存,总还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京海两难,你还保留个自由选择的心境。最最要不得的,就是今天打倒一个,明天又扶起一个,今天“京派”打倒“海派”,明天“海派”打倒“京派”,那就万劫不复、永无宁日了。在这个意义上,鲁迅于京海对立中对“海”的一次小小的偏袒,朱自清对京海融和的一次憧憬,都能够我们斟酌一番。

1995.2.28

沈从文的上海观

我读从文家书,对他 50 年代中、后期写自沪上的几封信很感兴趣。一个发起过京海论争的京派作家,在远离这个大都会这么多年之后,是上海改变了,还是他改变了呢?

沈从文似乎还是沈从文。他的感受是“我过去不欢喜这个地方,现在还是不欢喜”(1957.4.30 致张兆和)。但这次他把上海是落实在纸面上了,活的,一支生花妙笔描述了他眼中的城市情景。你可以具体触摸到他不喜欢的究竟是什么,试想他有没有道理。我心里的上海自然同他的是有区别的,不过,我和他有相似的经历,也在离开一段时间后于 50 年代末重返过上海,当时留下的记忆并未因时间的逝去而“淡出”。沈与我的异同,特别地能逗起我

的想像和思考。

有两点,我们的看法不谋而合。其一,是上海的“动”。市声喧闹,人们忙碌,城市睡得迟而苏醒却分外早。沈从文那一次是经山东而赴黄浦滩的,他把济南的安静,住家门里花木青青,街上人少,可悠悠散步的境界,评价为“这种环境是有助于思索的。它能帮助人消化一切有益的精神营养,而使一个人生命更有光辉”(1956. 10.8 致张兆和),提倡的是一种从容的文化气氛。我因已经不习惯童年所见的上海妇女凌晨5时进小菜场的辛劳,只是觉得人为一张嘴巴奔忙,何至于此。其二,是上海人对生活的讲究。沈从文深深感叹在这里人的精力被钱、物无意义地消耗着。我是后来生活在北方,稍稍知道些四川,熟悉东北人宁吃咸菜也要“置”几大件的精神,什么永久凤凰车、蝴蝶缝纫机,节衣缩食皆为迷信上海名牌。但川人可以节衣,绝不肯缩食,家中凌乱不堪,却端出锦绣饭菜饕客。所以,我的感想是,在中国惟上海人是衣食住行一样不肯马虎的。其中“住”的一项曾使得上海人脸上无光几十年,到了装修房间轰轰烈烈的今日,大家又不能不承认,上海仍是得风气之先的佼佼者。

沈从文50年代弃“文学”、从“文物”,但他的一双眼睛仍是文学家的。他描写的上海三轮车夫穿行马路如入无人之境的段落,简直精彩绝伦。不过说起过街的人脚步如飞,满街是人,每天有百万人在商店逛来逛去,沈的嘲笑的口吻十分显然。沈从文一再提起,这样的生活面貌对他太生疏了,他不认为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他多次地质疑,不明白这些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如何活法。应当说,沈从文对上海始终是隔膜的。实际上,这是商业城市很普遍的特征,只是上海在中国商业城市中首屈一指,又最早从传统模式里面解脱出来,许多人看不惯它罢了。上海的商业、服务业

发达,如果说消费场景全由富人构成,只是洋行大班和高等华人的太太充斥其间,即便是指过去,也不如实。上海自晚清以降,便云集了庞大的有闲阶级,这不假,但更有成千上万的从业人员。这些人从事商业又享用商业。绸缎庄的伙计出店吃盘冷馄饨加一客赤豆刨冰,小吃店的师傅下灶进对面电影院看场三轮片子,戏院检票的日场刚散偷空进布店剪块料子作夏天长衫,这些可都是工人阶级,也在满街跑来跑去。50年代之后可再加上来自各省的成千上万的供销人员、出差人员兼公费旅游者。以上即沈从文不知他们在作什么的人。沈从文埋怨这里服装店多,饮食店多,他还没到过行业集中的商街呢,比如40年代我常跟我一个叔祖父去现在北京东路一带的五金电料店,我小小年纪会惊异地发问,为什么这里开了几十几百家卖螺丝刀、老虎钳子的店呢?叔祖父说,笨小囡,这不是卖给上海人的,这是做全国的、南洋的批发生意的。当年我和我的长辈逛着这些商店,说不上也成了街景之一。要理解此地店家之多(沈从文没提到药店),一部分就是因上海的商业触角是伸向全中国、全世界的缘故。

沈从文还批评上海人吃零食的习惯,说:“和苏州许多人一样,吃零碎!永远是什么采芝香,采芝春,采芝什么的忠实群众”(1957.4.26致张兆和信)。他形容旧先施公司今上海食品商店人满为患,有妙句云:“一部分人并且口中国国有声。原来什么吃的都可零包出售,所以一面走、一面看、一面吃的人就越来越多。这个大城市过去是现在依旧是有百万计的人,都不怎么用脑子想生活以外事情,而对吃穿却有浓厚兴致的”(1957.4.30致张兆和信)。这本是江南的物产丰富,加上历史性习惯造成的。这习惯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但沈从文上的纲可够高的。讲究吃食、服饰、发型,在他看来统统属于糜费。“一些穿新衣在街上逛的年轻

人,都没有性格,都莫名其妙”(同上)。其实你到闸北、杨树浦工人区去看,也能见到这样荡马路的人。我60年代出差,与同事惊讶于上海街上新自行车之多、新“的卡”衣服之多。我们好事地做过马路调查,年轻人骑的自行车,大约百分之八十都是八九成新的。难道他们的车子骑不旧吗?后来到了委托商店一观察才明白,原来上海产的车子和蓝“的卡”,稍旧一点的,便从这里流向了全国。

上海与内地经济的不平衡,造成了这种态势。不是外地人不想吃零食,不想穿新衣,不想用新车。过去的东北,春节时用面袋装花生、冻梨、苞米花,直吃到正月十五。是平时不吃,过年大吃。现在的东北年轻人还肯一年吃这么一次吗?人的吃零食的天性,在富足一点的时候已经泄露无遗,街上的零食多得吓人,只是街头巷尾砰一声的苞米花转眼变成了无声息的美国苞米花而已。

沈从文的理想的生活,是读书和劳作;他理想的城市是清静的、能适宜于读书和劳作的城市。用这个标准衡量上海,他找缺欠找得很准,同时也就失去了一个完整的、丰富多彩的城市形象。他说了,这是个“和全国发展不尽合拍”,“待教育,待好好教育”的地方(同上)。

我同意“教育”上海,教育它在现代文明积累过程发生“畸变”随之带来的坏东西,如沈举的例子,十四五岁女孩子“就像被烘烤逼熟的”(1957.4.26致张兆和)。鲁迅当年写过《上海的少女》,也是这个意思。除此外,上海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先进区域,物质不说,便是在养成一代现代市民方面,还是有可供别人借鉴之处。就是说它也能“教育”全国。沈的家书偶尔也提到,上海的服务态度比北京好,小朋友横过马路,幼儿园老师口中一二一二地喊着,自己用倒退姿势走过去。上海人的礼貌、卫生、效率意识,公共秩序意识,一般是较高一点。沈从文只注意到吃零食问题,他没留意零

食带来的果皮纸屑在上海街上并未成为灾难，因大部分市民是不随意扔东西的。笔者 80 年代在一列发自襄阳的火车上，亲眼目睹大部分乘客如何像天女散花般将果皮、瓜子皮撒向车厢，以至经过一白天到达终点时，地下的零食垃圾几乎有半尺厚！还有，我在“反右斗争”后回上海，最新鲜的感受是电车上、商店里，“谢谢你”一语到处可闻。不像直到今天，众多城市的礼貌语言还经常停留在墙壁上。我那年在南京路电车上被“充手”（小偷也）充去了百十斤粮票，弄得狼狈已极。但身旁有人递我钱，让我“传一传”交售票员买票，先说“谢谢侬”，售票员递回票和找头又一声“谢谢侬”，买票者得票再一声“谢谢侬”，觉得一丝暖意。这是当时中国任何城市见不到的市景。上海公交车那时没有后来那么挤，执行上车买票、下车不交票的制度，对售票员的技术要求还是很高。但看老售票员常常端着俨然的一壶茶水上岗，目光四射，从容之态可掬，敬业之姿可见，真令人感动。他们怀有绝技，你买七分车票，两角递过去，他啪地找回来卷好的钱，一定是一毛三；用五角买一角四分的票，随手即回来一卷钱，正是三角六分。这都是事先准备好了的，一卷一卷插在票夹子里。我想，他们一有空可能就在准备这种找头。到了今天，我们坐上海的出租汽车会发现一种现象，在车子等红绿灯的时候，司机往往取出收据本子来，提前写上出发地、出发时间、终到地等事项。这是北京司机绝不做的。上海人的“动”和“忙”，就包含了如此讲求效率的内容。此类效率，对于广大内地来说，很长年代里似乎无用，自然不在沈从文的视野之内。

那么，沈从文住在上海大厦（旧百老汇饭店）的楼上，眼光会突然投向苏州河面的小船，就不奇怪了。他写下许多深情的文字，说城市睡下后如何能听到船儿的摇橹咿呀声，“这位老兄却在活动”；他在 1957 年的“五一”节凌晨五点半后，从饭店俯视下去，连续画